

← (上接 2 版)

甚至过去吃香一时的美钞也不能望其项背”(方静《解放前夕的上海》,《经济导报周刊》1949年第119期)。可见其时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基本职能都已难以履行。

实际上,进入1949年后,上海许多金融机构的董事长、总经理、经理等主要负责人,如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得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叱咤一时的上海滩金融巨擘均已陆续离沪。解放之初上海虽仍有约200家民营金融机构,但总体实力也已经明显下降,曾经的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不复之前的荣光。金融紊乱的背后,则是实体经济陷入半瘫痪状态。到解放之际的5月,由于既缺原料又无销路,占上海全市纺织工业生产总值76.4%的私营轻纺工业基本处于半停工状态[颜次青《上海纺织工业概况(1949—1957)》,《财经研究》1958年第4期]。在此情势下,纺织、化工、食品、海运等行业的不少民营企业将设备、资金和专业人才向香港、台湾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两地后来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此外,上海原有1800多家外资企业也已减少了一半左右,剩余910家中97%是英、美、法等国外企业[张侃《建国初期上海外资企业改造初探(1949—1962):以上海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 人民币怎样站稳了脚跟

上海的解放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也有着诸多待解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必须提前筹谋、有所准备。在接管沈阳等城市后,陈云就曾作出总结,认为“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各方面称职的专业干部”(《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9页)。基于此,接管上海的准备从1949年2月就已开始,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组成准备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由原山东省财政厅厅长顾准担任队长,南下到江苏丹阳县开展集训,学习了解当时能够掌握的所有关于上海社会经济现状的信息资料。这支队伍不断扩充,后所形成的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包括了



→ 迅速贬值的金圓券如同废纸

← 上海解放以后,报纸上关于军管会限制使用金圓券、推行人民币的报道



主任曾山,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秘书长骆耕漠,财政处处长顾准,金融处处长陈穆,贸易处处长徐雪寒,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等一大批党内知名财经干部[《接管上海·文献资料(上卷)》,第79页]。

与人民解放军5月27日一道进驻上海的是,4亿元人民币被从江苏运入上海存放至外滩的中国银行。这也是执行了平津战役后中共中央和军委曾下达的一个死命令——军队推进到哪里,人民币必须要跟到哪里。人民币的发行,也被寄予期望能推动“解放区货币的进一步巩固,和解放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人民日报》1948年12月7日)。接管上海后第二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发布“金字第一号”布告,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单位”,并明令将于1949年6月5日前废止金圆券,以1元人民币兑10万元金圆券比价在市内369个兑换点回收金圆券。随之,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于5月30日成立,后者逐渐在上海占据支配地位。截至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共收兑了上海市面全部金圆券流通额的一半左右,但现实经济生活对于人民币的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全国解放形势的向好,也对人民币提出新的更大数量要求。在此背景下,原中央印刷厂上海厂被接收改为上海印刷一厂并迅速扩建,加紧印制人民币。

金圆券的市场价值已不复存在,但人民币要真正站稳脚跟,还面临一个最强劲的对手,那就是解放前就已在市面上广泛流通使用的“老二”——银元。由于对此前金圆券的快速贬值心有余悸,人们对

新流通人民币的信心也没有完全建立,包括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也均用银元标价,形成了示范效应,放大了银元的市场需求。当时上海市民领到工资后除了赶紧去购买米、布、煤等紧俏食品和日用品之外,就是到黑市上去兑换银元,而换到手的银元又有不少被窖藏起来以储值增值、待价而沽。尽管此间中国人民银行为稳定人民币、平抑银价,也曾向市场抛出数万枚计的银元,但还是被市场上庞大的银元需求所消化吸收,几无效果。人民币在市场上的价格仍然一路狂跌,从5月30日的1银元兑650元人民币,跌到6月8日、9日的1银元兑2000多元人民币[参见曹树基、郑彬彬《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学术界》2012年第10期]。与之相应,6月1日至9日,米价上涨了164%,棉布上涨了95%,批发物价指数上涨174%[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城市接管》(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551页]。

非常规情境下经济手段的成效不彰,使得政府开始考虑其他非经济强制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6月10日政府对银元投机交易的中心场所——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查封,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人民币1545多万元,美元62769元,港币1304元(孙国《上海解放初期的经济保卫战》,《文史春秋》2004年第3期)。同日,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严禁金银计价行使、流通和私相买卖,市民有储存者,须向国家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于同日挂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进行银元收兑的指定

机构。经过此次金融秩序整顿,困扰上海多年的银元投机活动得以解决,银元价格和主要食品、日用品价格大幅下跌,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通货的地位也得到初步确立,这为上海随后运用经济手段有效应对多次的物价波动以及整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 民营经济恢复与上海经济的新生

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金融的枢纽,上海经济的不稳会导致全国经济甚至政局的不稳。如前所述,解放初上海又是民营经济占比较大的城市,且上海民营经济在全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可小觑,因此有侧重地稳定和发展上海民营经济,以带动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成为党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自上而下在上海解放初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任务。为此,1949年6月1日,上海市政府即决定对重要的及经营面临困难的民营工业企业以原料供应、产品收购、以货易货、银行信贷等政策手段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具体包括组织联营、下乡采购、转口贸易、重点贷款、订购产品、委托加工、委托代销等措施,成效显著。至当月9日,民营工厂中已有钢铁、制革、面粉、碾米、铅器等363家开工,占各业工厂总数的一半以上(《上海私营工厂一半以上开工》,《新华社电讯稿》1949年新370期)。

民族资本家、民营企业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6月1日,上海市商会曾致电毛泽东、朱德申明政

治立场,表示希望在上海“奠定社会主义良好基础”(《市商会电呈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商报》1949年6月2日)。次日,包括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侯德榜等在内的80多名工商业代表人士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邀请在外滩中国银行四会议厅举行座谈,时任市委书记饶漱石,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曾山、韦惠等市领导悉数参加,这堪称解放后上海的首场大型民营企业座谈会。会上,陈毅市长开宗明义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三座大山”,而不是在座的民族资本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私有财产应该被“容许存在和发展”,并保证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前提下,政府会考虑资本家们所担心的问题[周而复《回忆陈毅同志》,载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毅的讲话无疑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给民营企业恢复发展注入了信心,一个例子就是解放前去到香港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化工大王吴蕴初等也纷纷返回上海恢复企业运营。

对于上海的接管和民营企业生产的恢复,中央一直予以高度重视。6月21日,周恩来、陈云、李维汉曾在北京邀请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等民主人士与知名企业家进行餐叙座谈讨论,希望听取他们对党接管上海和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希望他们向上海工商界解释说明党对民族资

(下转 4 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古代西亚文物撷英

敬告读者:

6月7日端午节假期休一期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关注文匯學人

